

绪 论

他人的经验与教训，自身历史的回顾与研究，对任何事业的继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的历史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过程。研究企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与研究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其任务在于“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①。这就是说，研究企业历史发展中的盛衰变化轨迹，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懂得的。急功近利、只图眼前获利者，大有人在。这类企业家不重视企业本身历史的研究，尽管他们可以一搏赚取利润，但是，这种企业的活动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中，有些企业纵然一度有过辉煌的业绩，然而因为不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一碰到风浪就一筹莫展，企业的发展便停滞不前，甚至持续滑坡，直至倒闭。这类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与这类企业家不同，有战略意识的企业家往往很重视研究企业本身的历史，从中总结出企业经营活动的经验教训，作为制定企业发展方针的重要依据，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新的发展。

一些国外著名的企业，一般都十分重视自身企业发展史的研究，有自己的企业史专著；有些企业还设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企业史的研究，通过总结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企业今后的持续发展提供借鉴良策。在近代上海，也有一些著名的民族资本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家很重视自己企业的发展历程，不过，他们往往都是在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之后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回顾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虽然它们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新兴生产方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国家，民族资本工业时时处处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压迫和打击，使它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民族资本工业又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它们还有相当多的依赖性，而结果却始终摆脱不掉所处的危难境地。因此，近代中国的民族企业资本家阶级，既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对抗性的矛盾，具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同时又与它们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对革命表现出软弱性。这种被毛泽东称之为“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格，决定了民族资本企业家及其企业不可能改变自己面临的厄运。历史表明，民族资本企业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经济独立发展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它的发展才有可能出现一线生机。近代上海有一些民族工业企业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开始意识到从自己的遭遇中总结企业历史，为企业寻找新的出路。荣德生是这类民族企业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荣德生同他的胞兄荣宗敬创办的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面粉工业企业和棉纺织工业企业。荣氏兄弟自 20 世纪初投资开设工厂以来，企业经常面临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企业规模不再有什么大的发展，陷入了空前的重重危机，以致险些被外资势力和旧政府官僚资本势力所吞噬覆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创立的大半企业又惨遭毁损。然而荣德生依然雄心勃勃，决心重振事业。1942 年，他开始编写自传年谱，记述了荣氏企业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了企业盛衰变化的种种原因，并从实现国家工业化高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从中认识到，中国要抵御外国的侵略，摆脱贫困，富强立国，必须自力更

生，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民族工业经济体系。他强调，必须大办工业、大力发展本国的机器工业，同时还要发展农业、重视教育和培育人才，这些都是实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几个方面。因此，荣德生把企业未来的发展与国家实业建设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新设计了一个创新局面的宏大企业计划。这个计划在继续发展原有的面粉工厂和棉纺织工厂的同时，又创办麻毛纺织厂、机器厂、贸易公司等。为配合企业的发展计划，荣德生还兴办了专业教育事业^①。这个新的企业发展计划，因时局关系未能实现。事实上，在旧的社会制度下，这个计划即使得以实施，企业发展的前景依然不会是乐观的。但是，从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个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组建的集面粉工业、纺织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商贸为一体的企业集团，却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种完全崭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它在企业的整体发展趋势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有些企业家还善于从企业的经营管理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例如，在近代上海工商业中颇有地位的郭氏永安企业系统，它开创于香港、发达于上海，其创始人郭乐在历经数十年工商业的经营之后，为图进一步发展，深感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性。他说：“事业非检讨既往，不足以创造将来。”^②还在1948年时，其弟郭泉已撰有《四十一年营商之经过》一书1960年重修增补 更名曰《永安精神之发轫与长成》。其时 郭氏永安企业系统主要集中在香港一地 为使‘永安精神’能够‘继往开来 发扬光大’郭泉在书中总结了 10 条、30 个字的营商经验，即严稽核、重招徕、礼顾客、树模范、任人才、善采办、慎出纳、绝投机、励储蓄、肃家政。并指出‘永安企业系统’组织庞大、业务日繁、事权分掌，各有岗位，尤须彼此同心，团结合作，守望相助，勿以小我而忘大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 1989 年重印本。

② 《郭乐自述回忆录》，1961 年刊印。

我”才能使“永安精神 垂诸永久”^①。在永安精神的激励鼓舞下，永安企业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有的企业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还把总结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赋予新的意义。如大隆机器厂的老厂长严庆祥，在新时期的企业改革中尤为注重借鉴历史的经验。1979年夏秋之交，作者曾拜访过严庆祥，是年他已82岁高龄。大隆厂创办于1902年，是近代中国机器工业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一个代表性企业。严庆祥于1916年进广代父主持厂务工作，1919年起任厂长、总经理。当他知道我们是从事企业史研究的工作者之后，兴致甚高，话匣子一打开，便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言谈中，他一再强调，企业留存的历史资料，是一种“无价之宝”。他谈及大隆过去的治厂经验，并把它与日本丰田集团的历史发展相比较，为大隆的改革提供良策。这个经验之谈，后来被收录在《师竹翁传——严庆祥先生逸事》一书中^②。这些企业从自身历史发展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是企业员工所熟悉、也易为企业员工所接受的，当然有利于推动企业的发展。但是，没有一个企业的经验是完整的、十全十美的。从众多企业的历史发展中归纳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虽然在这些特点中所反映的某些内涵有着时代与环境的歷史规定性，但从企业发展趋势的规律而言，它们对于企业在任何时期的发展决策，都会给予人们重要的启迪，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在实践操作上也富有参考的价值。

作为经济发展的实体、城市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又是城市社会的重要基层组织，企业从经济生活上满足了人们生存所需的经济要求，又从社会生活上维系着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安定都有直接的影响。研究社会经济史也就必然会把企业发展的历史作为重要的组成内容。最近十多年来，企业史的研究在国内开始受到较多的

郭泉：《永安精神之发轫与长成》，1961年刊印。

② 秦建君：《师竹翁传——严庆祥先生逸事》台北1990年刊印。

注意 先后出版了一批企业史 包括行业史 的专著和专题论文 不仅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而且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企业史研究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学者所重视。

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是旧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发展与近代企业的兴起及其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的发展始终是构筑上海城市近代化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上海开埠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步步渗入并迅速扩张起来，成为在华外资势力的最大据点。外资企业在上海主要的经济部门中占有重要的乃至控制的地位。虽然本国资本企业（主要是民族资本私人企业）因受旧中国社会制度的制约，在外国资本主义强大势力的冲击和压迫下，始终处于畸形落后的状态，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但它在全国各地的民族资本企业中终究是一个行业门类最多、投资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城市。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即近代上海的民族企业是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来的，企业活动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企业盛衰变化有有什么特点。这些就是本书试图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它们对于当今深化企业改革、推进企业发展，也会带来有益的启示。由于工业很早以来就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主导部门，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其中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将以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工业企业发展变化的实例分析入手，对企业的历史发展趋势作综合性的探讨和研究。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概述近代上海工业企业产生的特点、企业数量发展的趋势及企业结构的演变状况。第二章和第三章论述上海工业企业组织发展模式的历史变化趋势，分析上海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组织群体模式的形成以及大、中、小企业同时成长的特点。第四章论述企业发展与市场的关系，探讨上海工业企业如何立足上海、走向大市场、如何运用市场竞争手段、协调同业关系、促

进企业的发展，树立上海的企业形象。第五章和第六章论述企业内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企业所采取的对策。第七章综合分析近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发展水平，历史地评价企业发展在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民族资本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从近代上海民族工业企业盛衰变化的历史性启示中探索企业发展的若干规律。

第一章 近代上海工业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上海工业的产生与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城市社会经济变化有密切关系，并随着上海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也较快，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设厂热潮，工厂企业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但是，其中不少企业却被历史所淘汰。企业的兴与亡都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的整体状况，与企业结构的演进变化密切相关。企业结构发展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协调的现象，它们又严重地影响着企业自身的正常发展。

第一节 工业企业的产生及其数量发展的考察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到 1894 年甲午战争发生之前，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时期。期间，外国资本工业首先在中国出现。随后不久，本国资本工业也相应产生。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最早、设厂最多、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市。

上海自 1843 年 11 月 17 日被迫对外开放、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便把上海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据点。它们以上海为中心，大规模地在中国进行掠夺性的贸易活动。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对华贸易的重心由广州移来上海，上海口岸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地增长，进出港口的外国商船数量明显增多。19 世纪 50 年代末期，每年进出港口的船只从 19 世纪 40 年

代的几十艘、一两百艘迅速增加到 2 000 艘左右。由于对外贸易的崛起、港口航运业的迅速发展,承接船舶修造业务的外资船舶修造工厂也就于 19 世纪 40 年代下半期应运而生,并成为当时稳获巨利的一个重要行业。1848 年英国人编纂的《中英年历》中就有这样一段叙述,那时外国商人在上海经营的各种行业中,“造船以及与造船有关的锻冶、制绳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经营这个行业的气势和冒险心,在上海哪一个行业中都看不到”^①。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在华设立的船舶修造厂愈益明显地主要集中到了上海。据 1850~1859 年的资料记载,外国资本在华新设的船厂共有 18 家集中在上海一地就有 12 家是有关修造船舶的工厂和行号^②。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西方列强凭借新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获得了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的航行权,对外通商口岸扩展到全国许多地方,外商通过上海联络各口岸的贸易又进一步迅速扩大,以致上海外资船舶修造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时期。从开埠以来至 1894 年的大约半个世纪中,外资先后开办的大小船舶修造厂有 27 家经过兼并改组,1894 年继续开工的共有 8 家资本总额达 323.8 万元,在上海外资工业总资本额中占到三分之一,成为上海外资工业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行业。这是由于口岸贸易的发展、航运业的兴起而在上海最先出现的外国资本工业。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加紧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从上海出口的生丝、棉花、皮革、蛋品等贸易明显增长因此为这些出口商品贸易服务的缫丝工业、轧花工业、制革工业、蛋品加工工业,以及因出口包装需要的机器打包工业等便在上海相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8 页。

②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64 页。原资料为 11 家另外还有一家 50 年代末美商霍金斯(E. Howkins)办的祥安顺船厂。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32~333 页。

继出现，发展也特别快，其中缫丝工业是上海外资出口加工工业中最为活跃的一个行业。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英、美、法、德各国商人先后竞相在上海开设了一批缫丝厂。截至 1894 年，留存开工的有 4 个厂，是投资额仅次于船舶修造业的第二大行业。除了上述两大行业之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还开办了以掠购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在上海就地生产商品销售于中国市场而经营的其他各种轻工业，如印刷、饮食、制药、卷烟、肥皂、火柴、榨油以及锯木、家具等行业。这些轻工业最初是随着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为适应外国侨民商务活动和生活需要而出现的。自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其生产的商品也开始销售于中国本土市场，工厂企业随之迅速增多。此外，煤、水、电等公用事业，也是从最初为满足外国侨民的需要而兴办，后来转向主要为推进新兴工业发展服务，并逐步成为外资工业中一个重要的投资部门。

上海本国资本工业的产生比在沪外资工业延迟将近 20 年光景。从 1865 年起至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除最先由清政府洋务派设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外，本国私人资本工业先后创办了 50 多家用新式机器生产的工厂。截至 1894 年，实际存在的、资本在银元 1 万元以上并自置动力设备的工厂共 31 家^①。其中，除机器棉纺织业和机器磨坊面粉业外，其他所有行业工厂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即它们都是在外资工业出现以后产生的，如船舶与机器修造业。这个行业同外资工业一样，是本国私人资本工业中产生最早、工厂最多的行业。它初创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时外资同行业已先后开设了二三十家工厂。本国私人资本船舶与机器修造工厂中，大多数的开办资本仅有数百元，但因它们都以承接外国船舶的零星小修理为主，其业务随着上海港进出口船只的不断增多而日益繁忙，因而利润率很高，资本积累比较快，

丁川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36 页。

企业的业务范围也在扩大，除船舶的修理业务外，还制造内河小火轮、结构简单的工作机器和蒸汽动力设备等。至 1894 年，企业的投资规模也有很大扩充，其中自置动力设备、固定资产净值在 1 万元以上的 7 家工厂总投资额增至 18.8 万元，平均每家工厂的投资额已达 2.7 万元，与初创资本相比，其增长速度可谓甚快，但与外资同行业相比，本国资本工厂平均每家的投资规模仅为外资工厂的 6.6%^①。又如出口加工工业，最突出的是缫丝工业。这个行业的外国资本工厂最初出现于 19 世纪 60 年代，本国资本的工厂创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它们的发展都很快。至 1894 年，本国资本缫丝工厂有 8 家，投资总额达 286 万余元，工厂数和投资规模都超过了外资工厂^②。再如其他轻工业中的造纸、印刷、火柴等业的本国资本工厂，也都是紧随外资工业出现之后，为适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而创办的。与上述行业的工厂不同，机器磨坊面粉业和机器棉纺织业则是在受到洋货来华销售之后，引起国内市场消费习惯和社会风气的改变而创设的。

总之，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上海近代工业的产生时期中，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的工业企业，它们的产生都与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作为战败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即允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以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一国得益，各国均沾。外国资本势力于是在中国都取得了设厂的权利。自此之后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 40 余年间，成为在华外资工业势力迅速扩张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历史阶段，外国资本势力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635、639 页。

②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636 页。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33 页。

不仅继续把中国作为其商品输出的销售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而且开始了大规模地对华资本输出，直接在中国投资设厂。由于中国有广阔的市场，而且中国工价甚低，就地设厂制造的产品成本足以与国外进口货竞争，同时外商还享有特权，可以稳获巨额利润，因此，上海的外资工业势力一面大肆扩充甲午战争以前非法设立的工厂，一面又加紧增设新的工厂，不仅在棉纺织、毛纺、卷烟、饮料食品、制皂、船舶与机器、电力、煤气、自来水等行业中形成了一批具有垄断性的大型企业，而且还有数量众多的较小规模的企业。自 1895 年到抗日战争前夕的 1936 年，上海外资工业的资本投入量从 975.2 万元增至 4 亿元，增长了 40 多倍，几乎平均每年以 9.2% 的速度迅速扩张，它们在一些重要行业中居于实际的控制地位。

面对在华外资工业的不断扩张和进口外货的大量倾销，本国民族资本工业作为其对立物而出现的办厂意识越来越强烈。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新式工业的创建进入了一个转折性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民国政府建立之后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式工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上海的本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则更为突出，行业门类不断增加，新设工厂呈持续增长的势头。其中，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政府之后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设的工厂多种多样”除原有的棉纺织、面粉、卷烟等重要工业继续设有新工厂外，又有一大批制造新兴工业品的工厂出现，如肥皂、火柴、毛巾、袜子、皮革、纸张、汽水、绳索、玻璃、针织品、糖果、饼干、草帽、毡帽、罐头食品、蛋制品、保险箱、天平、钟、搪瓷品、油漆、伞、化妆品、人造冰、唱机、唱片、钢琴、风琴、纽扣、线、胶片、镜子、针等等。此外还有印刷设备等等，不胜枚举^②。但是，受技术条件和资金等的限制，那时许多新兴工业企业还未获得稳固的基础，工厂规模一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2 页。

②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论（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9～80 页。

般都很小,数量也不多。至 20 世纪 20 年代,这些新兴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产品质量明显转好,新兴工业的发展才有了新的转机。如油漆工业中最早设立本国资本工厂是在 1915 年,但迟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才出现较快发展的势头,并初具行业规模。又如搪瓷工业,它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新兴工业,那时仅一两家小型搪瓷工场,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全能型搪瓷工厂,二三十年代之交时期又有一批新厂设立于上海。橡胶工业的兴起也有类似情况,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919 年产生了上海第一家橡胶厂,至 1927 年增至七八家,1928~1931 年是上海橡胶工业的全盛时期,除少数几家停工关闭外,至 1931 年实存橡胶厂共 48 家^①。上海民族工业发轫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发展于二三十年代的行业门类还有很多,如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电池等工业。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创的行业门类也不少,先后又创办了一批电器用具、电机制造、染料、热水瓶、调味品等新兴工厂。酸碱、酒精等基础化学工业工厂也开始出现。就历年工厂数量的发展趋势而言,它们都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有明显增多的势头。据 20 世纪 20 年代末对上海实存工厂开设年份的调查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38 年中设立的工厂,平均每年仅数家而已;当然由于开设年代久远,停业关闭工厂数量甚多,因此实际每年开设的工厂数远不止于此数。1914 年到 1928 年的 15 年中,平均每年新开办的工厂数则骤增为 80 余家^②。此后,工厂数量持续增长的幅度也不小。据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1929 年包含雇工 10 人以下的工厂在内,上海工厂的总数为 2 300 余家;1933~1934 年间,雇工 5 人以上的工厂总数已超过

上海市工商局等:《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 14 页。

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 第四种,南京 1932 年版 第 63 页。

5 000家^①。虽然前后调查统计的口径并不一致，但仅四五年的时间工厂增加的数量至少在 2 000 家以上。至 1947 年，上海大小工厂总数已增至 7 738 家。其中如按《工厂法》规定的“凡用发动机之工厂、平时雇佣工人在 30 人以上”的合法工厂数量来比较，1929 年有 699 家，1933 年增为 1 186 家，1947 年再增至 1 945 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工厂总数中占了 54.9%^②。上海中外资本的工业总产值长期以来也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半数以上，如其中在全国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的纺织工业产值几乎占全国同行业产值的一半；另外一些重要的行业，如饮食业、皮革橡胶业、造纸印刷业和其他一些主要的轻工业等行业，上海的产值在抗战以前均占全国同行业产值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③。直至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这些轻工业以及重工业中的机器、造船等行业仍都主要集中在上海一地。上海成为全国工厂数量最多、工业产值最高的一个城市，是全国最主要的工业中心城市。

第二节 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设厂热潮”

新式工业一旦兴起，它会随着社会近代化运动的向前推进而加快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同一般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并不是平坦地一直向前的，而是在不断起伏中不断前进的，工业的设厂热潮一个又一个地出现。中国的新式工业自 1895 年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也出现过多次设厂的热潮。这里所说的所谓“设厂热潮”，是相对于甲午战争以前设厂稀稀落落的状态而言的。由于

上海市社会局：《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1929 年）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战前上海工业之分布》，1939 年（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档案 04—2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社会科学院‘企业史中心’）”收藏。

^② 谭熙鸿主编：《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中华书局 1948 年版 第 26 页。

^③ 费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上册 中华书局 1947 年版 第 64 页插页第 1 表。

中国工业产生迟、起点低、资金短缺、技术水平也不高，更由于社会制度的因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重重压迫，它的发展甚为坎坷曲折。因此，名为“设厂热潮”，实际上新设的工厂数量还不能算很多。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设厂的条件比较有利；“设厂热潮”中新设工厂的数量比较多，有的行业新设的工厂有时甚至大多集中在上海。不同年代设厂热潮形成的原因，由于所处外部条件的差异而不尽相同。20 世纪初期，清政府在“实业救国”的社会舆论声中，提出了一些“新政”措施，奖励工商实业、振兴实业的风气大开。1905 年，上海发生商、工、学界要求政府拒签“美国禁止华工条约”、抵制美货的运动，并迅速形成为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于是，美国输华的布匹、煤油、面粉、卷烟等大宗货物销路大减，从而促进了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一批面粉厂、卷烟厂以及小型织布厂等因外货受到激烈抵制、市场出现空隙而纷纷设立，同时也新设了其他行业的一批工厂。新设工厂的数量比以前明显增多，1907~1909 年间，每年新设的工厂有 10~20 家以上。1912 年 1 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新政府把振兴实业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新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一系列有利于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相继制定实施。由于这些政策法令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它们对于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不能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再次出现了工厂增设的热潮。据 1928 年对实存工厂开设年份的调查统计，1912~1914 年间上海新设的大小工厂平均每年都有约 30 家，期间还有不少在 1928 年以前已经停闭或改组的工厂，因此，各个年份实际开设的工厂数当然会更多。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商品进口受阻，数量大幅度下降，以致市场商品紧缺、物价上升。这就对中国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意外的巨大推动力，出现了空前的设厂新热潮。这样一个难得的良机，又因为大战结束初期欧洲市场开放，急需各种物资，使中国一部分轻纺工业品走向国际市场，出口量增长较大，因此，继续推动着中国工业的较快发展。期间，在 1915 年和

1919 年两次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抵货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持续时间也长，原先作为日本输华的大宗商品，如棉布、火柴、卷烟等日用品在抵货运动中被大量拒于国门之外，于是生产这些商品的本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增设了一批新厂。此外，丝织、油漆、搪瓷、日用化学品等新兴行业也在抵货运动中开始出现或有明显地发展。这样，自大战开始以来直至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中，上海民族资本新设工厂的增长势头比大战以前更为明显，每年开办资本在 1 万元以上的新设工厂有二三十家左右，最多的 1921 年达 43 家。至于开办资本不满 1 万元的小厂，其数量更要多出几倍。1925 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又再次掀起全国性的抵制英货运动，随后又发展为抵制日货运动。这次抵货运动的声势规模与持续时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上海民族资本工业的投资活动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高潮。1925 年新设的大小工厂（包括开办资本不满 1 万元的小厂）总数首次超过百家，达 117 家；1926 年又增为 153 家；1927 年则更多，达 243 家^①。1928～1931 年是又一个设厂热潮，期间有 1928 年济南的“五三”事件和 1931 年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引发的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上海民族资本新的工业投资活动。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发布提倡国货的通令，实行保护国货政策，并在上海等地举办国货展览会，还颁布扶植、奖励工业的各种法规，裁撤厘金杂税，对本国工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还有两个有利于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政府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对“竞争性进口商品”提高进口关税，给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时机。二是金贵银贱的影响，银价自 1928 年之后连年下跌，因此国货制造成本日渐低廉，有利于与外货的竞争，新厂增多、老厂

①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2 页。

② 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上业》，中华书局 1930 年版，附表。

扩充遂出现一时勃兴现象。因此,上海“自十七年(1928年)以至二十年(1931年)本埠设厂数目突然增加”行业分布也广其中“多侧重于纺织、化学、机械暨其他日常用品之制造”^①。据1931年的调查,1928~1931年间,新设工厂总数1087家,平均每年新设271余家,成为上海工业产生以来设厂最多的年份^②。之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再也没有形成新的设厂热潮。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侵入上海,由英、美、法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管辖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宣布“中立”,租界则成为大片沦陷国土中的一块“孤岛”。它处于直接的战火之外,形成一个特殊的环境。这里集中了大量从战区来的人口,也带来了一批物资和资金,市场消费需求激增。而且,当时上海对外的海运仍在通航,国外贸易尚未断绝,广大内地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沦陷区都急需上海的工业品,整个市场出现了畸形繁荣的现象,大批租界以外的工厂纷纷迁入租界内复工开业,又新开了一批又一批的工厂。据上海公共租界的统计,1938年底,租界内的工厂总数已超过战前2倍以上,达4700余家。1939年新厂设立更多,至1940年上半年,上海共有工厂总数已增至6300多家^③。其中,除从租界外迁入的老厂复工以及日本人经营的工厂外,两年多来新设立的工厂总数估计至少在2000家左右。有些行业的新设工厂数超过了原有的老厂数。例如造纸业,战前原有的10家造纸厂大多遭到掠夺破坏,除1家内迁外,或停工或被日方强行收买和合办,幸存下来的只有1家厂,而1938~1940年间在租界内新建的造纸厂就有15家^④。又

① 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5~16页。

② 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页。

③ 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9~111页。

据记载,1939年公共租界内新设工厂为1705家,此数可能包括迁入复工的老厂在内(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编印,第476页)。

④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180页。

如染织业,1939年上海共有染织厂414家,其中约半数以上是新设立的。还有一些行业也有类似情况。但是,“孤岛”的设厂热潮,一般企业为时仅两年左右,很快就陷入衰退的境地。抗战结束以后,国内外市场开始恢复和扩大,加上战后初期政府当局实施低外汇政策,各种工业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进口价格低廉,并在投机市场的推波助澜下,大多数工厂经整顿后得到了恢复,也刺激了大批新厂的设立,又一次在上海出现了战后短暂的设厂热潮。据估计,1946~1947年间新设立的工厂约在1000家以上。

在历次设厂热潮中,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实际上也并不都是一样的,如设厂热潮出现的年代、原因及新设工厂数量的多少都有一些差异。下面对缫丝、毛纺织、制药、橡胶和机器修造等工业加以考察。

上海民族资本缫丝工业是民族工业中产生较早、投资规模较大、工厂数量较多的一个行业。中国是生丝出口大国,因此,缫丝工业的兴衰变化与其他行业不大一样,主要是受国际生丝市场的需求变化和价格涨落的影响比较大。甲午战争以前,外商在上海设立的一批缫丝厂,因经营不善而无意继续开业,因此,华商在甲午战争以后的1896年一举新设了16家缫丝厂,以求扩大生丝的出口量。但是,由于生丝的出口被洋行垄断,洋行用各种办法压低生丝收购价,加上丝厂本身技术落后、丝质不良、国际竞争能力差,因此,丝厂业务极为脆弱,呈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据资料记载,1896年出现全行业200万银两的巨额亏损,以致1897~1900年间丝厂每年都有减少。1901年起新设丝厂虽有增加,但工厂总数直至1908年均未达到1896年之数。1909年欧洲主要产丝国意大利发生地震,生丝产量受损很大,国际市场生丝价格上涨,于是,我国生丝出口大增,刺激了中国丝厂的发展,上海丝业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设厂热潮,这一年共新设14家缫丝厂,丝车数比1895年增长了1.8倍。此后,丝厂和丝车数量继续一路上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因欧洲交通运输困难,生丝出口受影响,行